

# 《周素园文集》序

王震

我和周素园相识，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那是在红6军团担任政委，长征途中经过贵州的时候。

1936年2月，我红2、6军团攻占了黔西北重镇毕节。进城之初，有的基层干部不明情况，看到一座古旧宅院，料想是地主之家，便带人进去“打土豪”；不料却在书架上搜出好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书上密圈细点，说明都经书的主人仔细读过。他们奇怪了：“地主还读马列？”便把情况向上汇报，我马上派人把这家主人请来相见。他就是周素园。

通过交谈，我了解到周素园的去以及他热心阅读马列书籍的原因。原来，他早年曾是晚清的贡生。在朝政腐败、国难日亟的形势下，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使他冲破了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的樊笼，积极参与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贵州光复后，作为贵州革命元勋之一，他被推举为大汉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但不久，大汉贵州军政府被贵州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唐继尧部滇军所颠覆。周素园被迫流亡，奔走于京、汉、沪、渝等地，一方面为了谋

生，同时也企图借助外部力量恢复贵州的革命政权。但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正遇到重重困难，无力给予切实的支持；而求助于南北各派大小军阀，则无异于与虎谋皮。经过十几年的徒劳奔波，周素园失望地回到了家乡。但他并没有绝望，仍在积极地寻觅救国救民之路。这样，当他一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便热心地研读起来。

周素园的情况很快就受到贺龙、任弼时首长的关注，他们多次和周素园亲切会见倾谈。我和军团长肖克同志、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同志也反复向他讲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特别着重宣传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和我军北上抗日的任务。周素园结合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和从马列书籍中读过的理论，很快就提高了对党和红军的认识，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毅然同意出任由我军组建并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

由于周素园为人正直，在各阶层人民中有比较高的威信，他的参加革命工作在



红2、6军团部分干部在长征途中于贵州省大定县城合影。

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使我军在毕节地区得到了将近一个月的休整时间，并扩军5000人。

不久，我军主动撤离毕节，继续北上抗日，周素园不顾自己年迈多病，坚决要求随军行动。组织上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他对组织上派来劝说的同志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起初，周素园同志随我红6军团政治部行动。我和他经常同桌而食，同室而眠，朝夕相处，苦乐与共，不但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也增进了彼此间的革命情谊。长征的艰苦是众所周知的，他硬是坚持住了。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红军撤离毕节、转战乌蒙山期间，周素园利用他过去的社会地位，给当时云南地方军队的负责人龙云、孙渡写信，劝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红军北上抗日

的正义行动，而不要助纣为虐，为蒋介石火中取栗。龙、孙接信后，从自身的利益考虑，果然放松了对红军的堵截，为我军胜利渡过金沙江造成了有利的战机。

由红2、6军团合组成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合后，为了方便作战，周素园奉命改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一直到长征结束。

长征结束后，他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和礼遇，还见到了其他许多中央领导同志。

西安事变时，他利用过去的社会关系，给当时国民党的许多党政要人写信，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做了许多工作。

抗战爆发后，他受任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并受毛泽东同志亲自委派返回西南，从事地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临行前，毛泽东同志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称他为“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

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对他作了极高的评价。

我们再度相见，已是1951年10月，在解放后的北京。这时我才知道，在他离开延安以后，先后到了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每到一处，他都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开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各地当局也加紧了对其活动的监视限制和阻挠破坏。他不仅无法正常工作，还不断受到特务的威胁恐吓，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他被迫再度退隐乡里，清贫自守。这期间，他终日闭门读书，特别是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他也十分关注时局，热切地盼望着光明的到来。

光明终于到来了，1949年11月，周素园又在家乡迎了解放。他出任县和地区的支前委员会主任，做了很多工作。后来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解放给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以和自己年迈衰弱之躯极不相称的旺盛精力，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党和政府联系教育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工作中，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他的工作和进步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扬，党给了他更高的信任和荣誉。他这次到北京，就是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会议期间，他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单独接见，还会见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肖克等老朋友。

不料，这次重逢竟成了永诀，1958年2月，从贵阳传来了周素园病逝的噩耗。

周素园是我党和我军的老朋友和忠实同志，也是我个人的老朋友和忠实同志。对于他的逝世，我是很悲痛的。

现在，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编写《周素园文集》，并交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这表明了我党对这位老朋友的深切怀念。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

周素园的一生，经历了中国从“东亚病夫”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大历史变化。这个变化从何而来？一切别的路子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周素园文集》有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这个历史选择的进程。

周素园的一生，是一个爱国者追求救国救民之路，历经艰难挫折，终于找到真理的一生。周素园一生的曲折经历，揭示了一条真理：在现代中国，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阻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只要坚持不懈地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斗争中，他最终必定认同并走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康庄大道。《周素园文集》真实地纪录了周素园的也是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心声，从而客观地反映了他们为寻找革命真理所经历的这一艰难历程。

周素园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从19世纪到20世纪），经历了三个时代（清朝、民国、新中国）。在此期间，在贵州、西南乃至全国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他都是亲历者或亲闻者。周素园平生勤于著述。他的文字，不仅以文采见长（在青年时，他便有“才子”之名），而且以严谨著称。《周素园文集》的编写出版，无疑可以为研究贵州、西南乃至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提供又一份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因此，我很赞成《周素园文集》的编写出版，并且很乐意地写了以上的话，作为这本书的序。

1991年10月·北京

（选自《周素园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